

近代徽商“解体”辨

冯剑辉

(黄山学院 社科系,安徽 黄山 245041)

摘要: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近代徽州外出经商的风气更加浓厚,经商人口所占比例很高,形成了庞大的商人网络,并出现了向近代转型的趋势。无论是徽州本土、徽商经营地、徽商本身还是建国后的人民政府,都认为徽州商帮依然存在,因此,近代徽商“解体”、“退出商业舞台”的结论值得商榷。

关键词:近代;徽商;解体;存在

中图分类号:F129.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47X(2010)01-0014-08

徽商是明清时期中国最大的商帮,但在道光年间盐法改革、咸同年间的连串打击下,徽商在近代^①衰落了,这是学术界一致的看法。但近代的徽商作为一个商帮是否还存在?较多的看法认为,徽州商帮在近代已经“解体”了:“从道光中叶至清末的近百年间是徽州商帮的衰落与解体阶段。”^{①④}更有学者认为,“到蒋介石统治时期,奄奄一息的徽商,只有完全退出商业舞台。”^②受此影响,学术界对近代徽商重视不够,成果也相对有限。但近年来,已经有学者提出应该加强对近代徽商的研究。^③笔者认为,近代徽州经商风气更加浓厚,商人网络庞大,近代徽商是否已经“解体”乃至“退出商业舞台”,值得商榷。

一、近代徽州商人群体的扩大

明代中期以后,徽州外出经商的人数众多,队伍庞大,这是判断徽州商帮形成的重要根据。这种风气在晚清和民国时期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来得更加强烈,徽州商人群体仍在继续扩大。

(一)从地域上看,传统的徽商重镇歙县、休宁,

出贾风气依旧,即使是原来经商较弱的绩溪、黟县等地,在近代也出现了大规模外出经商的潮流

明清徽商称雄天下,但徽州六县的商业发展是很不平衡的,歙县和休宁商人占据主导地位,婺源和祁门次之,绩溪和黟县则一直较弱。就盐商而言,歙县商人在两淮占优势,休宁商人在两浙占优势,这两县的商人出贾较早,实力也最强。晚明时歙县人方弘静称:“今大江南北称素封家者,则归歙、休矣。”^③显然,在他看来歙县、休宁两县的商人足以作为徽商的代表。今天亦有学者认为,“明代中期,休、歙二县经商已经成风,其活动范围几乎遍及全国。”^④并以此作为徽州商帮形成的标志。而其他诸县则与歙、休两县有明显差距,例如祁门县,万历县志虽称该县“服田者十三,贾十七,”^⑤康熙县志则认为祁门商人“智浅易盈,多不能累千万。”^⑥可见,祁门人经商虽不少,但远不若歙县、休宁资本雄厚。

进入近代以后,徽州六县商业发展上的不平衡发生了重大变化。不但歙、休两县出贾之风依然浓厚,其他原先商业不甚发达的各县亦出现了大规模的出贾之风。民国《婺源县志》引光绪《婺源县志》称该县“不善服贾,……士农之家五,商之家三,工之

收稿日期:2009-10-12

基金项目: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项目“近代徽商研究”(2009SK306);黄山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近代徽商转型与徽州社会变迁研究”(2007XSK003)

作者简介:冯剑辉(1971-),安徽休宁人,黄山学院社科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徽州学。

家一,”其后附民国县志作者按语云:“婺源多田少,以商为命,今商务益替,立农林会,创兴实业,”^{[7]④}可见近代婺源经商人数量有了明显增加。又如黟县,直至康熙年间仍然是“民尚朴实,读书力田,不事商贾,……徽商遍天下,而黟独事耕作,鲜经营。徽号华邦,而黟多朴陋,虽休、歙不远数十里,终不以侈丽易其俗。”^[8]但到了晚清,黟县风俗为之一变,“俗重贸易,男子成童,即服贾四方,视农为贱业。”^[9]黟县终为休歙侈丽之俗所移,不再独事耕作了。再如绩溪县,乾隆年间仍然是“惟守农业,罔事商贾。”^[10]嘉庆年间,歙县人江绍莲同样认为,“绩俗极俭,安守本分,为诸邑所不及。语云‘惟有绩溪真老实’。”^{[11]⑥}但是入晚清后,绩溪出贾之风日益强劲,据宣统年间绩溪人朱麒麟调查,绩溪人中“农约三十,商约三十,士约一十,工则百分中不过数人焉,……所趋在商。”^{[12]⑫十二}

(二)近代徽州经商人口所占比例极高

近代徽州经商人口比例高,这从若干近代人口统计数据中可窥见其端倪。

首先,可以分析歙县的近代人口统计数据。清代道光年间(1820-1850),歙县的造报户口实数为617111人。咸同战后,人口大减,同治八年(1869)调查户口实数为309604人,这应该是近代歙县的人口最低点。然而,依宣统元年(1911)的人口统计资料,歙县仍然只有30万人。^{[13]⑮}在1869-1912的42年间,并未发生特别严重的灾荒、瘟疫和战乱等足以抑制人口增长的恶性事件,而人口总数竟毫无增长。这种现象连县志作者也深感惊讶:“夫自同治九年至清末,中间已越四十余年,何以丁口之数尚未加多?”他的解释是:“盖自光绪以来,东、北、西三乡,因生计关系,迁徙、死亡,户口有减无增,虽南乡一乡日见繁盛,究难补三乡之不足,较之同治八年调查时,未能增多。”^{[13]⑮}这里“因生计关系”而进行的“迁徙”,绝大多数就是外出经商谋生了。

其次,可以分析黟县的近代人口统计数据。同治六年(1867)的人口总数为155445人,宣统二年(1910)县政府档案的人口总数为71326人,而各区列表人口相加总和为80166人,县政府数据与各区总数有一定的出入。^{[14]⑯}即令以基数较多的各区列表人口数据为准,则1867-1910的43年间,黟县人口不但没有增加,反而下降了75279人,降幅达48.4%,相当惊人。对此唯一的解释是,这个期间黟县发生了大规模的人口外迁,不但抵消了人口的自

然增长,还大大减少了居住在黟县本地的人口,这与前述近代黟县经商风气大增的记叙是完全吻合的。

从歙县、黟县的人口统计数据可以看出,近代徽州人外出经商的比例是很高的。但这个比例究竟有多高呢?民国《歙县志》称“商贾居十之七,”^{[13]⑮}一则经商比例高达70%。《黟县乡土志》中称同治年间黟县人所从事职业中,“士约五百人,农约七千余人,工约两千余人,商约四万余人,”^[9]黟县经商比例在80%以上。当然,这些都是一种粗线条的估计,而且主要反映的是成年男性所占的比例,但从前述歙县、黟县人口总数的变化来看,这些估计是有根据的。

徽州地方志中唯一提供了近代从商人口比例的具体统计数据的,是建国后新编的《绩溪县志》。该志称:“县人在外从事工商业者,据民国七年(1918)统计,占全县男性成年人总数57%。……36年全县人口职业调查,在县境外经商人口总数占总人口24.36%。”^{[15]⑭}1918年57%的数据为成年男性经商的所占比例,未将妇女儿童计算在内,换算成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总人口所占比例,与1947年24.36%应该大体相当。

徽州境内一些小区域内的人口数据与上述数据基本吻合。据绩溪县民国二十三年(1934)所作的外出经商人口比例的调查:“瀛洲乡王村、周村各占成人数的21%,半茶占26%;镇头乡江窑头占20%,庄川占25.7%;旺川乡江郎村占20%,黄会山占40%,旺川村占45%;北村乡水村占40%,伏岭乡伏岭下占41.9%。”^{[15]⑭}即使是在经过多年战争后的1950年,中共皖南区委农委会进行的调查发现:“绩溪县余川村二百户中,在家人口为六百三十一人,而出外经商的为二百一十人;黟县南屏村九百七十五个居民中,其中外出经商的有一百九十三人。”^[9]即余川村经商人口比例为33.2%,南屏村则为19.8%。

根据上述较为可靠的人口数据可以推定,近代徽州经商人口占男性成年人口的50%左右,占全部人口的25%左右,这个比例在一个农业国中是相当高的。^⑤

二、近代徽州经商风气浓厚的原因

近代徽州人外出经商风气更加浓厚,其实是近代徽州社会经济基础的必然产物。

(一)咸同战乱对徽州农业基础设施造成了严重破坏,加上农村自我救济能力减弱,使农村所能容纳的就业人口进一步减少

长达 10 余年的太平天国战争对徽州地区的房屋、家畜、耕地、山林等农业基础设施造成了严重破坏,加上大量人口在战争中死亡,因此战争结束后,出现了严重的田地荒废现象。这从下表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表 1 近代歙县田地数额变化一览表^①

时间	田(亩)	地(亩)	山(亩)	塘(亩)	折实总额(亩)	下降(%)
道光七年 (1827)	353721.7	135402.5	100557.6	14520.8	490618.6	—
同治二年 (1863)					160000	63.4
同治八年 (1869)					215090.1	56.2
宣统末 (约 1911)	213553.9	83202.9	61254.5	5142.4	292995.9	40.3

依据上表,可以看出:在战争尚未完全结束的同治二年,田地总额下降了 63.4%。经过 6 年的初步休养复垦后,至同治八年,田地总额依然下降了 56.2%;即使经过 40 余年的休养生息,至宣统末年,“较之原载田额,……尚不及十分之六。”^[13]三田地山塘是最基本的农业生产资料,出现如此严重的下降,反映出近代徽州农业已经严重萎缩,农村的贫困化程度必然上升。

徽州农村向来是聚族而居,宗族组织是最主要的救济来源,大小祠堂都有一定的土地可供出租,其收入可以用于对贫困成员进行救济。但是,在战乱中徽州各宗族族产损失非常惨重。如歙县潭渡黄氏,康熙年间,黄以祚、黄以正兄弟“业饬维扬,富甲大江以南,”“郎中公履昊,以正公之子也,其所置东西庄义田,尤啧啧人口,”^[16]这是潭渡黄氏用于宗族内救济的主要资产。然而在战后,潭渡黄氏的义田遭到了严重破坏,“兵燹以来,岁入之谷,尚不足以供祀事,而丰塲义田,废弃益甚,族众聚议,束手无措。”^[16]又如绩溪洲许氏,“祠产业丰隆,燹后半遭遗失,虽先哲屡年查理而缺陷尚多。”^[17]还有婺源槐溪王氏,“咸同而后,民遭兵燹,世运陵夷,由后征前,支丁仅有其半,而又村无富室。”^[18]

可见,徽州农村中的各宗族在咸同兵燹中都遭受了沉重打击,“吾歙多望族,清咸同间遭红羊之乱,世家大族大半凋零,”^[19]实力严重下降,其救济能力严重削弱。农村中的大量贫民既不能在农业中找到出路,又得不到救济,因此必然从农村中分离出来,成为剩余劳动力。

(二)近代徽州工业化进展缓慢,无法容纳大量就业人口,经商成为解决生计的主要出路

近代是中国工业化的初始阶段,创办工业,可以吸纳农村地区的部分剩余劳动力。但近代徽州地区的工业化进展是相当缓慢的。宣统年间,徽州知府刘汝骥为了促进徽州产业的发展,在屯溪举办过一次徽州府物产会,集中了当时徽州最有竞争力的工商产品。物产会对展品进行了评奖,休宁县获奖最多,从该县的产品中,可以一窥近代徽州生产力发展水平。

一等奖牌:农业公司:肥丝;胡开文:百寿图墨;黄锡祉:肥丝;永记茶号:凤眉。

二等奖牌:同昌永茶号:娥眉;洪士翹:制茶模型;洪士翹:水碓模型;协和树艺公司:蚕茧、蓝条稀布、毛巾;大盛公司:芦通布;裕生纺织厂:提花蓝布;李祥记茶号:贡珠;同德仁:鹿茸。

三等铜牌:珠里纺织传习所:甬布;万成织布厂:花布;甘正才:织布竹梳;江同源:白铜四眼壶;程合记:春石耳、春鹿角、春野神、春茯苓;宁振丰:葛精;宁振丰:京庄火腿;石翼农:黄精、祁朮;经余堂:藕粉;应仁丰:炉底锡;阮德兴:炉底锡;黄竹笠:铜矿;涂期和:金矿;同昌永:毛峰茶;邵鸿恩:山水四幀;胡茹易:罗经;黄莹:花卉四幀;吴得新:纸质兰花、纸质珠兰;周海呈:梅花;王桂香女士:通草、通草盆花;恒大成:生漆;南先学校学生王文煥、吴国彦、章钟桂:铅笔画。^{[12]8-1}

从这个获奖名单可以看出,清末徽州最主要的物产仍然是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进入民国年间后,徽州工业发展仍然很缓慢,“抗日战争前,徽州工业多是从事铁、木、竹、棕、五金修配的‘五匠’和提供生活需要的糕点坊、糟坊、酱坊、油坊、豆腐坊等‘五坊’。”^{[20]107}这五匠、五坊其实主要是手工业,而不是近代的工业。直至新中国成立之初,徽州成规模的工业仍很少,容纳的就业人口也很有限:“私营工业从业人员 1.2 万人,个体手工业 2 万人。”^{[20]107}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养家糊口,徽州农村的大量贫困人口选择外出经商谋生。这在文献中记载很多:

洪立登,“少孤贫,事母汪氏惟谨。壮服贾,家渐裕,往来吴楚。”^{[7]卷四十}

齐宏仁,“少孤贫,以积累资与郎某在汉口合开茶行。”^{[7]卷四十二}

汪国仪,“家贫力学,后业瓷景镇,积货设肆运

贩粤东。”^{〔7〕卷四十二}

王文俊,“家贫苦学,性孝友。弱冠后,就商江苏。”^{〔7〕卷四十二}

齐淦,“三岁失怙,赖母金抚养成立。家贫,就商,渐饶裕。”^{〔7〕卷四十二}

胡承合,“父早故,孤贫,以小鬻贩为活。稍长,学业景镇,久之,始积微资。”^{〔21〕}

赵有贵,“幼孤贫,随母赁舂糊口,稍长习商,旋赴屯溪学锡罐业。……铢积寸累,遂开专号,家称小康。”^{〔14〕卷七}

舒法甲,“幼孤贫,习商业于江西九江。”^{〔14〕卷七}

许廷佐,“幼家贫,蒙塾不怠,年甫十二,远贸通州,习典业。”^{〔14〕卷七}

上述商人,因家贫无食,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以经商为出路,这正是整个徽州贫困人口寻找出路的缩影。

(三)徽州素有经商的传统,加以商人网络的发达,为徽州农村劳动力转入商业提供了独特优势

与其他地区相比,近代徽州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入商业具有独特的优势。徽州地区的茶、木、墨、砚等产品本身就是重要的商品;农村中有一技之长的人较多,等等。但最重要的无疑是徽商在称雄明清300年的时间内形成的经商传统和商人网络,为农村人口转入商业领域就业提供了其他地区难以比拟的便利条件。

明清徽州是中国乡族观念非常浓厚的地区,各地徽商以宗族、乡党关系结成相当牢固的商人集团,共同构成了规模庞大的人际关系网络,因此徽州人经商往往是成群结队的。明末休宁人金声认为徽州人“既业贾,故挈其亲戚筹资而与共事,以故一家得业,不独一家得食而已焉,其大者能活千家、百家,下亦至数十家、数家。”^{〔22〕}这是对徽商群体经商、结成网络的生动描述。这个商人网络在近代的战乱中遭受了沉重打击,但仍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并在战乱平定后逐步恢复。徽商个体是其中最小的单位,而那些拥有一定实力又有较强的乡族观念的商人,则是这个网络中最活跃的联结点,成为徽州同乡进入商业领域的引路人,例如:

朱文煊,“在粤八载,凡徽郡流寓不能归者,概给路费十金,士人倍之,每岁不下二百余金。”^{〔7〕卷四十}

李守恭,“其先世经商湖北岳家口。弱冠丧父,祖年迈,诸弟幼稚,力承先业。发捻之乱,停业远避,店伙数十人皆同乡,道梗不得归,不忍患难相弃,率

之上避于川陕。乱平,重理旧业,绌于资本,人以其信义素著,皆乐与之往来。”^{〔14〕卷六}

余达,“少从叔庵贾于上海,慷慨好施,千金不吝,戚党仰其衣食者不可胜计。道光年间华洋通商,凡至上海营业者,达力为保荐,间有不善营业耗资负贷者,达为代偿,不责署券,一时有‘小孟尝’之目。”^{〔14〕卷七}

余光焕,“作贾广信,独捐贻建徽国文公祠前楹,并购店屋,以租息为春秋祭祀之需。凡同乡之无业者,代为谋事,或给资本令归不少吝惜。积资数千,赈恤孤贫,尽耗无存。歿之日,哭临者途为之塞,广信士商至今誉之。”^{〔14〕卷七}

近代徽商网络渡尽波劫后,重趋活跃,在联络乡谊、团结徽商、扶助乡党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成为徽州人从商的有力后盾。

三、近代徽州商帮依然存在

(一)近代徽商从事行业众多,并出现了向近代转型的趋势

近代徽商从事行业众多。从文献看,大多数徽商仍然从事传统行业,如盐业中的李宗焜,典业中的汪赞纶,茶业中的汪裕泰,墨业中的胡开文,等等,成就斐然,前人著述已详载。同时,近代徽商身处欧风美雨交相浸润的时代,投资于新兴产业并取得成功的不乏其人,纺织业中的汪宽也,西医业中的汪惕予,电力业中的吴兴周,金融业中的汪联洪、朱晋侯,等等,其事迹也逐渐为人重视,可视为近代徽商中成型转型的范例。^⑦

犹可注意的是,在近代中外贸易迅速发展的过程中,随着外商洋行在华业务的拓展以及洋商个人事业、生活上的需求不断增加,徽商中出现了—一个充当中外媒介的买办群体。如黟县人孙雨亭,“就外人礼延,为之经理房产;”^{〔14〕卷六}王圻,“同治初,海禁大开,圻习英语,能得夷情,当道每有交涉,率丐圻赞助,洞中肯綮。”^{〔14〕卷十四}婺源延川的金氏家族,更有多人专门在上海茶业中充任买办。

金廷芳,“旅申,习英语,为通事。”^{〔7〕卷四十八}

金奎,“佐父经商沪汉间,以茶业起家,习英语,为洋商所信服,遂为茶业领袖。”^{〔7〕卷四十八}

金国振,“幼从父兄行商海上,遂家焉,佐兄经营茶栈,习英语,为茶商通事,重气谊,人咸听指挥。”^{〔7〕卷四十八}

金树焜,“随兄经商得沪,间习英语,为茶业通事,忠于谋人,群商倚如腹心。”^{〔7〕卷四十八}

20 世纪初是中国买办发展的高峰,曾有学者归纳出近代中国 70 名最有势力的大买办名录,其中徽商出身者有 5 人,分别是婺源人吴懋鼎,绩溪人胡寄梅、胡二梅,歙县人程德成、周宗良。^⑧他们在积累了相当数量的财富后,积极投资于近代工商业。以吴懋鼎为例,他幼年随父经商苏州,同治六年进入上海汇丰银行,光绪六年出任汇丰银行天津分行首任买办,号称天津四大买办之首。在天津期间,吴懋鼎与李鸿章结成了十分密切的私人关系,充当淮军银钱所总办,积极参预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其主要事迹包括:

协助李鸿章装备海陆军。李鸿章的淮军陆军与北洋海军严重依靠进口装备,这些军火进口有很多都是由吴懋鼎通过汇丰银行和谦顺洋行代理的,包括英式“林明吞”步枪和“哥伦布”炮等等。吴懋鼎还曾为北洋水师的装备采购充当过李鸿章和英国之间的中介。

参与创办近代运输业。光绪十三年,经李鸿章保荐,吴懋鼎以候补道身份参与津唐铁路官轨总局管理,后继唐廷枢担任津榆铁路官轨总局总办,完成了津榆铁路修筑。

创办近代工商业。光绪十二年冬,吴懋鼎集资 1.8 万两白银创办了天津自来火公司,生产火柴;光绪二十四年,投资 25 万两创办天津织絨厂;光绪二十九年,投资 15 万两创办北洋硝皮厂;光绪三十年,创办天津电灯厂和自来水厂。天津早期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中资本较大的大部分是吴懋鼎创建的。除天津外,吴懋鼎还曾出资 50 万两,与英商合办京效门头沟煤矿。

吴懋鼎也同样是维新变法中的志士。他在戊戌变法期间经王文韶保荐,出任新设立的农工商部大臣,曾多次上奏光绪皇帝,建议设立商会,开办农业科学教育,成立农业中学堂,创建农学总会,引进国外农业机械,改良丝茶业,等等。变法失败后,他被视作帝党官僚,撤职抄家,几遭杀身之祸,幸得李鸿章的保护,加以与英国关系深厚,方得幸免。

对于象吴懋鼎这样的买办,不能因为曾效力于洋行,即简单地当作帝国主义走狗。实际上,当买办自己创办的事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与洋商之间往往会发生利益上的冲突,进而会有所反抗。吴懋鼎在创办天津自来火公司时,明确宣布以“抵洋产而

保利源”为宗旨。中法战争期间,法国侵略军封锁台湾,刘铭传部被困于台北,粮饷枪弹将绝,多次告急。李鸿章召集幕僚商议对策,最后决定由吴懋鼎出面向英商天津怡和洋行租用六艘外国商船,将军火粮饷运抵台湾,使刘军获得接济,台湾形势亦转危为安。^⑨

对于买办和洋商之间这种复杂的关系,中国共产党理论家瞿秋白很早就关注到了。他曾撰文指出买办有“性情驯服与不驯服的区别,”“性情不驯服的”买办公然倡导“国家主权和民族平等,……竟有些赤化嫌疑。”^{〔12〕}徽商买办在欧风东渐之初,充当中外交通的媒介,促进了进出口贸易的发展,推动了中国工业化的起步,对中国的近代化,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可以视为徽商在近代转型的象征之一。

(二)近代徽商会馆林立,商人网络庞大

明代晚期,随着徽州商帮的发展壮大,逐渐出现了由徽商主导建立的各类会馆组织。与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网络相比,会馆是一种按照同乡关系组建起来的地缘网络,冲破了血缘关系的限制,能够有效地将不同宗族的商人团结在一起,规模更大,影响力远远超过了单个徽商宗族。近代徽商中为会馆的复兴与重建奉献心力者比比皆是,其中,江苏、浙江、江西三省的记载较多。

江苏:

黄振甲,“自少运木毘陵。……其地方所设安徽会馆、施棺所、养济院、育婴堂及汪子双池书局,皆慷慨输金,以襄义举。”^{〔7〕卷四十}

洪国桥,“总理如皋质库,其间平讼累、厘宿弊、建会馆、立义阡、置腴田拜扫,皆赖桥筹画襄成。”^{〔7〕卷四十一}

宋宗芳,“商海门。……集建星江会馆,逾年告成,旅海门者咸德之。”^{〔7〕卷四十二}

欧阳萱,“商于苏之溧阳。……同乡德之,推为首事,重建徽国文公祠宇,凡属重要,力任其难,理会馆事十有余年,一介不取,皆服其廉明精干。”^{〔14〕卷七}

浙江:

金德高,“商于杭州,倡建江干惟善堂。”^{〔13〕卷九}

吴宗淦,“尝客遂安四十余载,通运监之河,定急公之局,修会馆、造渡船。”^{〔7〕卷四十}

詹荫梧,“贸易平湖,尝欲立会馆以敦梓谊,徽商皆有难色,适王廉访竹屿来宰平湖,梧具陈其意,王为集徽商议,嘱梧首捐钱五百缗为倡,又购地二十亩作义冢,同乡咸称美举,乐助焉。”^{〔7〕卷四十一}

江西:

叶兹坐,“贾饶时,领袖建婺会馆,首输银一千余两。”^{[7]卷四十}

曹德谦,“少贾鄱阳之石门,生业充裕,独力建星江会馆。”^{[7]卷四十}

詹永樟,“随父客景镇,适建徽州会馆,众推樟廉正,领袖督工,又举专司馆务。”^{[7]卷四十一}

吴辅嗣,“贸易南昌,倡建速爱堂。”^{[13]卷九}

上海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商业、金融和贸易中心,当地聚居的徽商也最多。早在同治元年,受战乱影响,涌入上海的徽商,“即在浦左计之,殆不下数万人矣。”^[24]重建思义堂序有学者估计,民国年间在上海经商的徽商有十三四万人之多。^{[1]664}作为近代徽商网络的中心,上海的徽商会馆不但为数众多,特点也相当突出。其中由徽州宁国两府商人建成的徽宁思恭堂是上海最早的会馆:

乾隆甲戌,宁郡程公炳临经始其事。越岁己丑,新安张君国嵎酌定章程,适歙邑侍御胡君诒珩者,行旌至沪,颜其堂曰“思恭”,迄今已有六十五年矣。历年既久,功垂成而未成,幸得新安诸乡台输财效力,不憚辛勤,顿使数十年颓废之公事忽然振兴,壮观厥成焉。^{[25]序}

徽宁思恭堂在太平天国战争中遭到严重破坏,同治、光绪年间多次重建,至光绪三十三年,规模大备,“沪上为诸会馆荟萃之地,大都注重华美,若论工料之坚实,布置之周妥,实为诸会馆冠。”^{[25]徽宁会馆全图记}作为近代规模最大的徽商同乡组织,它的影响很大。民国年间的文献记录表明,经常为该堂捐款的徽州商号和商人数千之多。民国五年,徽宁思恭堂的总收入为大洋28915元,支出为13187元,有15728元的结余。^{[25]大总捐款}可见,由于沪上徽商的踊跃捐献,徽宁思恭堂的财务状况相当好。

除了徽宁思恭堂外,上海徽商同乡组织规模较大的至少还有10余个。这些公堂会所包括两类:

(1)同业公所。例如星江茶业公所,由婺源茶商组成;徽宁梓业公所,由徽州宁国两府木商组成;松江的新安崇义堂,主要由徽州典商控制。

(2)地区组织。南汇的思义堂则,“举歙县、休宁、婺源、绩溪四邑绅商轮流管理,”^{[24]总序}是徽州四县商人的组织,而闵行慈善堂是包括徽州全部六县商人的组织。

除了长江中下游之外,即使是传统上山陕商帮势力范围的陕西省城西安,嘉庆年间也创建了有相

当规模的徽商会馆。据同治年间的征信录记载,为西安徽商会馆捐款的商号有数百家,在当地是一支可观的商业力量。西安徽商会馆在农历九月十九朱子生辰时,举盛宴招待乡亲,竟至“昼夜演戏,所费不貲,”^[26]颇为当地人所侧目。

凡此种种,足以证明,随着徽州商人队伍的进一步壮大,近代徽商会馆在全国遍地开花。民国年间许承尧称:“吾徽人笃于乡谊,又重经商,商人足迹所至,会馆义庄,遍各行省。”^{[1]357}这充分说明徽州商人聚结成帮的特点在近代依然非常鲜明。

(三)团结互助,商帮团体意识和自我认同强烈

正由于近代徽州经商人数量众多,队伍浩浩荡荡,而且结成了庞大的商人网络,因此无论是徽州本土、徽商经营地还是徽商自己,都认为徽州商帮依然存在,这种团体意识和自我认同是相当强烈的。武汉是长江中游最大的工商业城市,汉口更号称九省通衢,考察近代徽州商帮的团体意识,武汉或可作一范例。

汉口早在明代中期即有徽商的足迹,到了清代就更多。民国年间,徽商在汉口仍有相当的势力,有估计认为,民国年间,汉口徽商每年贸易额在700万两左右。^⑩武汉当地人对当年徽商经营的情况有如下说明:

除汉阳鹦鹉州和武昌白沙州,湖南木商居绝对优势,没有谁能和他们相比外,其余各地区和各行业,徽州商人都很有势力,在若干行业中居统治与专利的地位,别地商帮是不能与他们竞争的。^{[27]125}

不仅如此,徽州商帮还将手伸进了湖南宝庆帮在汉口码头的势力范围,引发了双方长期冲突。

汉口沿江上起大水巷,下至沈家庙一带,原是一块不毛之地,野草丛生。随着汉口商业的日趋繁盛,民船渐渐来此停泊。嘉庆初年,湖南宝庆府商人就开始建了码头,但由于当时宝庆帮船只尚少,往返路程远,所需时间长,没有留人留船长期看守,徽帮乘机占了码头,不让宝庆帮商船靠岸,于是引起宝庆帮、徽帮争夺码头的争斗。^⑪

从嘉庆年间开始的汉口徽帮与宝庆帮之间的码头争夺战,持续了将近100年。由于这个码头本为宝庆帮所建,且得到了当地湘籍官僚的支持,因此宝庆帮占了上风。徽帮为了与之抗衡,“富贾巨贾操纵安徽籍的白莲教下的部分船民,组织了一个襄(阳)徽联盟,企图以武力夺回码头。几经械斗,未能获胜。”^⑫有学者分析认为,“械斗双方均以地域为组

织,同乡商帮组成的会馆成为历次争夺码头、巩固码头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各帮内部虽然也存在矛盾(这种矛盾也具有地域性,)但对外帮时,大都态度一致。”^①

徽商素有“儒商”之名,极少有与人动刀弄斧的记录,但汉口徽帮为了抢占本属宝庆帮的码头,竟然勾结白莲教大打出手,其强悍实为罕见。凡此种种,无不证实近代徽州商帮不但存在,而且不乏强悍的“帮性”和“战斗力”。

近代徽州商帮的存在同样反映在徽商的自我认同中。民国年间歙县商人吴日法所撰之《徽商便览》或可对本文所讨论问题做一小结。

吾徽居万山环绕中,川谷崎岖,峰峦掩映,山多而地少。遇山川平衍处,人民即聚族居之。以人口寡乳故,徽地所产之食料,不足供徽地所居之人口,于是经商之事业起,率车牛远服贾,今日徽商之足迹,殆将遍于国中。夫商人离其世守之庐墓,别其亲爱之家庭,奔走四方,靡有定处者,乃因生计所迫。而故乡之大好山水,固无日不萦绕于梦魂中。是以徽商有三年一归之旧制,游子天涯,赖有此尔。^{[28]6-7}

这段话说明:(1)近代徽州人之经商服贾,实因农村贫困,为生计所迫。(2)近代徽商足迹遍布全国,“无徽不成镇”之谚起于近代,实非偶然。^②(3)远出服贾的徽州人,对徽州具有强烈的自我认同,对自己的身份定位也非常明确——徽商二字即足以概括。

结 论

咸同年间徽商确实衰落了,但在战乱冲击之下,整个中国社会经济在全面走下坡路,徽商又岂能独善其身?战争结束之后,徽州经商出贾之风愈加浓厚,众多的中小商人与若干大商人合在一起,构成了为数达几十万的近代徽商队伍,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否认咸同年间徽商的衰落是错误的,夸大这种衰落,甚至断定近代徽商“解体”、“退出历史舞台”,同样不够准确。1950年,中共皖南区委农委会在调查中发现,“部分农村地区经商的人很多,尤以徽州地区为最著名,他们足迹遍及江、浙一带,有‘徽帮’之称,”^③可见建国初期的人民政府也认为徽州商帮当时还存在。所以,近代徽州商帮的存在是不容否认的事实,“解体”、“退出商业舞台”之说,值得商榷。

注释:

- ①本文所指近代,包括道光及其之后的晚清时期与民国时期两个阶段。
- ②参见赵华富:《徽州宗族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张朝胜:《民国时期的旅沪徽州茶商:兼谈徽商衰落问题》,《安徽史学》1996年第2期。
- ③按:此处据《黟县乡土志》,抄本,作者佚名,记事截止清代同治末年,原件存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笔者所引为黟县地方志办公室1985年的抄件。
- ④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安徽省农村调查[M]》,上海:1952:13。
- ⑤按:关于近代徽州的人口统计数据,除上述资料外,还有清末冯煦、陈师礼编纂的《皖政辑要》卷十五《户籍》中清光绪三十年的资料,其中歙县人口为194857人,黟县人口为38607人,这个数据显然太低,应该只是成年丁口的数据,本文不拟采用,附辨析于此。
- ⑥本表依道光《徽州府志》卷五《食货志·赋役》、民国《歙县志》卷三《食货志·赋役》中数据综合而成,地折田比例为56.1%,山折田比例为43.4%,塘折田比例为119.1%。
- ⑦此处提到的近代著名徽商,其事迹可参考下列文献:胡时溪、舒育玲:《清代后期徽商巨贾李宗樞》,《黟山文史》首辑;王振宗:《〈汪作麟同年哀挽录〉中的徽州典商事迹》,《安徽史学》2005年第2期;邵之惠:《上海“汪裕泰茶庄”》,《徽州文化研究》第三辑;徐子超:《胡开文墨业系年要录》,《江淮论坛》1992年第6期;〔日〕松浦章:《徽商汪宽也与上海棉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4期;陆翔,陆兵:《我国近代医学教育家汪自新传略》,《安徽中医学院学报》2000年第6期;邵之惠:《芜湖“明远电灯股份有限公司”》,《徽州文化研究》第三辑;程其康:《我所知道的上海公估局》,《黟山文史》首辑;叶荫藩:《金融巨子朱晋侯》,《黟山文史》首辑。
- ⑧参见徐矛:《中国十买办》,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 ⑨本文对吴懋鼎事迹的叙述,参考了曲振明:《官商合一吴调卿》,载政协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天津十大买办》,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3-78页。
- ⑩武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武汉文史资料》1994年第2辑[M],武汉:1994:82。
- ⑪武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武汉文史资料》1996年第1辑[M],武汉:1996。
- ⑫按:同治四年(1865),浙江塘栖新安会馆《募建缘起》中称:“经营商贾之客,贾迁九州,相传有‘无徽不成市’之谚。”(参见《塘栖新安怀仁堂征信录》,光绪十六年刻本)这是目前可考资料中接近“无徽不成镇”时代最早的,但仍有一字之差,反映出此谚语尚在形成中。至宣统年间,徽州知府刘汝骥在告示中称:“我国有‘无徽不成镇’之谚,此环球所公认。”(参见刘汝骥:《陶甓公牍》卷一)更足证此谚语广为流传是在晚清。民国年间,许承尧修《歙县志》加以采用:“沿江区域,向有‘无徽不成镇’之谚。”(民国《歙县志》卷一)许承尧之说为今日学术界广为引用,作为徽商对中国市镇经济发展作用的绝佳形容,而这个谚语恰恰是近代才流传开来的。

参考文献:

- [1]张海鹏,王廷元.徽商研究[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
- [2]李则纲.徽商述略[J].江淮论坛,1982,(1).

- [3]方弘静.素园存稿·卷九[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121册.济南:齐鲁出版社,1997.
- [4]刘和惠.徽商起源于何时[J].历史研究,1982,(4).
- [5]余士奇.祁门县志·卷四[Z].刻本.祁门:1600(明万历二十八年).
- [6]周溶.祁门县志·卷五[Z].刻本.祁门:1873(清同治十二年).
- [7]江峰青.婺源县志[Z].刻本.婺源:1925(民国十四年).
- [8]王景增.黟县志·卷一[Z].刻本.黟县:1683(清康熙二十二年).
- [9]胡存庆.黟县乡土地理[M].铅印本.黟县:1925(民国十四年).
- [10]席存泰.绩溪县志·卷三[Z].刻本.绩溪:1810(嘉庆十五年).
- [11]许承尧.歙事闲谭[M].合肥:黄山书社,2001.
- [12]刘汝骥.陶甓公族[M]//官箴书集成·第十册.合肥:黄山书社,1997.
- [13]许承尧.歙县志[Z].石印本.歙县:歙县旅沪同乡会,1937(民国二十六年).
- [14]吴克俊.黟县四志[Z].刻本.黟县:1923(民国十二年).
- [15]绩溪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绩溪县志[Z].合肥:黄山书社,1998.
- [16]黄质.宾虹杂著[M].排印本.歙县:1918(民国七年).
- [17]湖州许氏宗谱·卷十[Z].活字本.绩溪:追远堂,1914(民国三年).
- [18]李林石.槐溪王氏宗谱·卷十[Z].刻本.婺源:世贤堂,1893(清光绪十九年).
- [19]张树煌.东源重修张氏宗谱·第四册[Z].刻本.歙县:叙伦堂,1928(民国十七年).
- [20]徽州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徽州地区简志[Z].合肥:黄山书社,1990.
- [21]胡大成.清华东园胡氏勋贤总谱·卷七[Z].刻本.婺源:世贤堂,1916(民国五年).
- [22]金声.金正希先生文集辑略·卷四[M]//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50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 [23]瞿秋白.上海买办阶级的权威与商民[J].响导周报,1926,(162).
- [24]安徽思义堂.思义堂征信录[Z].石印本.上海:1917(民国六年).
- [25]徽宁思恭堂.徽宁思恭堂征信录[Z].石印本.上海:1917(民国六年).
- [26]胡肇智.安徽会馆录[Z].刻本.西安:1867(清同治六年).
- [27]曹觉生.解放前武汉的徽商与徽帮[C]//《江淮论坛》编辑部.徽商研究论文集.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
- [28]张海鹏,王廷元.明清徽商资料选编[G].合肥:黄山书社,1985.

责任编辑:高 煥

On The Disintegration of Modern Huizhou Merchants: A Different View

Feng Jianhui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 Huangshan University, Huangshan245041, China)

Abstract: In modern China, many Huizhou people engaged themselves in trade, resulting in a large business population and an extensive commercial network. This article disputes the view that the modern Huizhou merchants already disintegrated and claimed that they still exist and are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economy in today's economy.

Key words: modern; Huizhou; merchant; disintegration; existence

作者：[冯剑辉](#)，[Feng Jianhui](#)
作者单位：[黄山学院, 社科系, 安徽, 黄山, 245041](#)
刊名：[黄山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HUANGSHAN UNIVERSITY](#)
年，卷(期)：2010，12(1)
被引用次数：0次

参考文献(53条)

1. 本文所指近代, 包括道光及其之后的晚清时期与民国时期两个阶段
2. [赵华富](#) [徽州宗族研究](#) 2004
3. [张朝胜](#) [民国时期的旅沪徽州茶商: 兼谈徽商衰落问题](#) 1996(2)
4. [黟县乡土志](#)
5. [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 [安徽省农村调查](#) 1952
6. [冯煦](#). [陈师礼](#) [《皖政辑要》卷十五《户籍》](#)
7. [《徽州府志》卷五《食货志·赋役》](#)
8. 民国《[歙县志](#)》卷三《[食货志-赋役](#)》
9. [胡时滨](#). [舒育玲](#) [清代后期徽商巨贾李宗楣](#)
10. [王振忠](#) [《汪作黼同年哀挽录》中的徽州典商事迹](#)[期刊论文]-[安徽史学](#) 2005(2)
11. [邵之惠](#) [上海“汪裕泰茶庄”](#)
12. [徐子超](#) [胡开文墨业系年要录](#)[期刊论文]-[江淮论坛](#) 1992(6)
13. [松浦章](#) [徽商汪宽也与上海棉布](#) 2000(4)
14. [陆翔](#). [陆兵](#) [我国近代医学教育家汪自新传略](#)[期刊论文]-[安徽中医学院学报](#) 2000(6)
15. [邵之惠](#) [芜湖“明远电灯股份有限公司”](#)
16. [程其康](#) [我所知道的上海公估局](#)
17. [叶荫藩](#) [金融巨子朱晋侯](#)
18. [徐矛](#) [中国十买办](#) 1996
19. [曲振明](#) [官商合-吴调卿](#) 2002
20. [武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武汉文史资料1994年](#) 1994
21. [武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武汉文史资料1996年](#) 1996
22. [塘栖新安怀仁堂征信录](#)
23. [刘汝骥](#) [陶甓公牍](#)
24. [许承尧](#) [歙县志](#)
25. 民国《[歙县志](#)》
26. [张海鹏](#). [王廷元](#) [徽商研究](#) 1995
27. [李则纲](#) [徽商述略](#)[期刊论文]-[江淮论坛](#) 1982(1)
28. [方弘静](#) [素园存稿](#) 1997
29. [刘和惠](#) [徽商起源于何时](#) 1982(4)
30. [余士奇](#) [祁门县志](#) 1600
31. [周溶](#) [祁门县志](#) 1873

32. [江峰青](#) [婺源县志](#) 1925

33. [王景增](#) [黟县志](#) 1683

34. [胡存庆](#) [黟县乡土地理](#) 1925

35. [席存泰](#) [绩溪县志](#) 1810

36. [许承尧](#) [歙事闲谭](#) 2001

37. [刘汝骥](#) [陶壁公牍](#) 1997

38. [许承尧](#) [歙县志](#) 1937

39. [吴克俊](#) [黟县四志](#) 1923

40. [《绩溪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绩溪县志](#) 1998

41. [黄质](#) [宾虹杂著](#) 1918

42. [涇州许氏宗谱](#) 1914

43. [李林石](#) [槐溪王氏宗谱](#) 1893

44. [张树煌](#) [东源重修张氏宗谱](#) 1928

45. [《徽州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徽州地区简志](#) 1990

46. [胡大成](#) [清华东园胡氏勋贤总谱](#) 1916

47. [金声](#) [金正希先生文集辑略](#) 2000

48. [瞿秋白](#) [上海买办阶级的权威与商民](#) 1926(162)

49. [安徽思义堂](#) [思义堂征信录](#) 1917

50. [徽宁思恭堂](#) [徽宁思恭堂征信录](#) 1917

51. [胡肇智](#) [安徽会馆录](#) 1867

52. [曹觉生](#) [解放前武汉的徽商与徽帮](#) 1985

53. [张海鹏](#). [王廷元](#) [明清徽商资料选编](#) 1985

相似文献(10条)

1. 期刊论文 [冯剑辉](#). [FENG Jian-hui](#) [近代徽商地缘网络研究——以上海同乡组织为例](#) -[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 31(1)

近代、扬州衰落,上海成为徽商最大的聚集中心。徽商在上海多个行业中都有重要影响,构建成庞大的徽商网络。在血缘关系构成的宗族组织之外,由地缘关系构成的同乡组织在徽商网络中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徽商同乡组织通过举行祭祀、联欢祈福、捐助公益来加强彼此间的联系,用团体力量维护徽商权益,也有效地凝聚了徽商的向心力,强化了徽商的团体意识,在动荡的岁月中维持了长期的经营。

2. 期刊论文 [蔡玲存](#) [近代徽商传统优势丧失的原因](#) -[考试周刊](#)2009(8)

明清时期徽商以其资金雄厚、经营范围广、势力大、经验丰富而著称,其经营的主要项目是盐、典、茶、木。但到了近代,徽商在一些行业中的优势开始丧失。文章主要从徽商的官商结合、战乱摧残、资金的流向和近代经济形势的变化四个方面分析了徽商优势丧失的原因。

3. 学位论文 [冯剑辉](#) [近代徽商研究——以1830~1949年为中心](#) 2008

本文以近代徽商这一长期被学术界忽视的课题作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历史学、徽学、区域社会研究、社会转型理论等分析工具,探讨近代徽商的兴衰存亡,透视这一历史悠久的商人群体在近代的转型规律,分析其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作用,并探究其经验教训。全文分为导言、正文(共八章)和结论三个部分。

导言回顾徽商研究的学术史进程,概括其中的主要学术问题,对其学术风格进行分析,并探讨徽商研究的若干理论基础问题。在充分肯定当前徽商研究所取得成绩的基础上,对其不足部分进行检讨,特别是近代徽商的研究明显不足,已经成为徽商研究中亟待加强的薄弱环节。针对此一不足,确定本文的研究对象和撰述旨趣。

第一章,在简要回顾明清徽商后,详细分析近代徽商的历史背景:盐业制度变更造成徽商中坚力量-盐商-的严重衰败;国内战乱的严重冲击;外来入侵的威胁。因此近代徽商所处的环境是空前严酷的。

第二章,集中辨析近代徽商“解体”论。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近代徽州出贾经商的风气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更加浓厚,经商人口所占比例很高,商业队伍浩浩荡荡,形成了庞大的商业网络。无论是徽州本土、徽商经营地、徽商本身还是建国后的人民政府都认为徽州商帮依然存在,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近代徽商“解体”、“退出商业舞台”的结论是值得商榷的。

第三章,主要论述近代徽商经营的最重要的行业——茶业。咸同兵燹之后,徽州茶商迅速恢复,1865~1916年间徽州茶商发展迅速,获利丰厚。民国后期,在国际市场冲击和国内战乱的影响下,徽州茶商走向衰落,但仍掀起过一度复兴的浪花。茶业是近代徽州经济发展的龙头,提供了重要的就业机会,也深刻地改变了徽州经济的地理布局,促进了新的商业城镇的兴起。近代徽州茶业经营以出口为导向,茶商直接参与国际竞争,这个迥异于以往的特点既促进了徽州茶商的大发展,也使它在衰落期逐渐落入了金融资本的控制。

第四章,对近代徽商经营的诸多传统行业进行论述。近代徽商在盐业、典业、木业等传统行业中仍然相当活跃,并在某些行业中占据了绝对的优势。一些行业中的徽商还结成了组织严密的团体,影响很大。

第五章，集中论述近代徽商的转型。在近代中国社会的大潮中，传统色彩浓郁的徽商也开始走上向近代转型的道路，从徽商中分化出的买办阶层是近代中外经贸发展中带有特殊印记的产物，也是徽商转型的象征，对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和中国经济的近代化起过重要作用。更有一批徽商积极投入新兴产业领域，并取得过重要的成就。认为近代徽商不思进取的“落后”论是有失偏颇的。

第六章，分析近代徽商在徽州社会变迁中的地位和作用。近代徽商取代了传统士绅，成为徽州社会的中坚力量。清末新政时期，徽州绅商曾活跃一时，发挥过重要作用。近代徽州教育、公益等事业的进步主要依靠徽商。徽商从沿海地区引入的新风尚，也促成了社会风俗的转变。徽商是近代徽州社会变迁的主要推动力量。

第七章，对以上海为中心的徽商网络进行考察。扬州衰落后，上海成为徽商最大的聚集地，各类同乡组织，尤其是徽商会馆成徽商网络的中心。徽商会馆通过神灵祭祀、联欢祈福、捐助公益、团结互助，有效地凝聚了徽商的向心力，强化了徽商的团体意识，对徽商能在近代动荡的岁月中维持长期的经营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八章，婺源江湾萧江氏是明代中期兴起的著名徽商家族之一，咸同年间在战乱的严重冲击下衰落，但在光绪和民国年间，由于家族中徽商子弟事业有成，出现了复兴的景象。本章以江湾萧江氏为中心，剖析近代徽商的典型个案。

结论：部分，对本文的主要观点进行归纳。近代徽商既具有浓厚的传统气息，又具备了一定的时代精神，它处在转型之中，但转型的进展是不平衡的。作为近代徽州的中坚，徽商在社会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徽州和经营地的近代化进程曾经作出过重要的贡献，其经验教训，值得认真总结。

4. 期刊论文 [近代徽商转移上海的原因分析 -巢湖学院学报](#)2009, 11 (5)

开埠前徽商在上海的活动就很活跃，开埠后，徽商更是进一步向上海转移，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主要从上海在开埠后地理优势的发挥和它特殊的政治格局，以及徽州在此时生存压力的加大和徽州人传统的经商习惯两个方面来分析徽商在近代（上海开埠后到民国初）进一步转移上海的原因。

5. 期刊论文 [刘家富. Liu jiafu 近代旅沪徽商的“乡土之链”——徽宁会馆述论 -江苏社会科学](#)2010 (3)

近代上海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工商业城市，全国各地商人云集于此，“五邑杂处”，其中徽商一直是活跃于该地区的重要商帮之一。传统中国强烈的乡土观念促使各地旅沪商人建立自己的同乡团体，以此来联络同乡之间的乡谊，维护同乡自身利益，因此，众多的徽商客居和贸易于上海催生了徽宁会馆。徽宁会馆在其存在的二百余年里，以其完备的组织机制和健全的规章制度，充分发挥了自身特有的社会功能，有效地凝聚了寄寓上海的同乡商人的向心力，同时也强化了徽商在异地他乡的团体意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旅沪徽商商业活动的长期进行。同时，做为一个客籍商帮的同乡组织，徽宁会馆还是近代上海城市商业发展历史过程的见证，在近代上海城市社会政治、经济和其他方面的发展过程中起到过一定的作用，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上海城市发展的历史轨迹。

6. 学位论文 [蔡玲存 徽商的近代发展与式微——以其在上海的活动为例](#) 2009

本文主要是根据民国时期徽州六县的地方志、上海碑刻资料以及前人研究的成果，采用归纳、综合的方法，运用历史学、徽学、区域社会研究等分析工具来分析徽商自开埠以来在上海的活动，说明徽商势力在近代依然存在，并曾对上海社会的发展起到过积极作用。

本研究主体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了开埠前后徽商在上海的基本活动情况，探究他们在近代进一步转移上海的原因；第二部分介绍了近代上海徽商对茶业、典当业、墨业和其他传统行业的继承和发展，说明在近代他们的影响和势力依然存在；第三部分阐述近代徽商在上海商业活动中遭遇的困难和挑战，为适应时代的需要，徽商开始转向更有利润空间的商业活动中，如投资房地产，经营西医药业等，最后分析在此过程中徽商在近代上海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文章指出，道光之后，在战乱冲击之下，其他各个商帮受到的冲击同样是十分惨重的，而不仅仅是徽商一家。近代徽州商帮的存在是不争的事实，夸大徽商的衰落，并断定近代徽商“解体”、消亡是值得商榷的。

7. 期刊论文 [王世华 也谈“贾而好儒”是徽商的特色——与张明富先生商榷 -安徽史学](#)2004 (1)

张明富先生认为“贾而好儒”不是徽商特色，而是明清商人的普遍特征。本文不赞成这种观点，指出：一，张明富先生的论证方法有问题，单纯的例证法不足以证明某个事物的基本趋势、基本倾向。二，徽商“贾而好儒”的特色也得到了同时代人的认同，这一特色的形成，是与徽州这一特殊地区密切相关的。三，张文所分析的明清商人普遍“贾而好儒”的原因，从逻辑上说是不能成立的。四，儒家观念并非传统商人未能踏入近代门槛的主要羁绊，能否超越儒家思想的屏障也非中世纪商人与近代商人的最大区别。

8. 期刊论文 [陈梅龙. 沈月红. CHEN Mei-long, SHEN Yue-hong 宁波商帮与晋商、徽商、粤商比较析论 -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7, 20 (5)

晋商、徽商、粤商是明清时期的重要商帮。晋商以“票号”著称，一度执全国金融界之牛耳。徽商厚朴敦实，其在盐、粮、木、布帛、典质等传统商业领域的成就称雄一时。粤商果敢练达，在内外贸易中均独树一帜。但他们或生性刻板，或好儒而轻贾，或囿于内耗，在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的演进时期，没有适时变革，充分正确地发挥商业资本的作用，渐次落到时代后面。崛起于鸦片战争后的宁波商人，乘新陈代謝的时代潮流，以其稳健慎密勤勉的风格，顽强拼搏，求新求精求美，创造了中国近代经济史上的许多奇迹。他们爱国爱乡，开放通达，善于经营的特质至今仍享誉世界。与时俱进，锐意变革，这是宁波帮后来居上，成为近代中国最具影响商帮的主要原因。

9. 期刊论文 [王继红 晋、徽商衰落的文化因素分析 -中国西部科技](#)2008, 7 (9)

晋商、徽商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实力的两大商帮，但两大商帮发展到近代都随着封建王朝的消亡而走向衰败，晋、徽商衰落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文化因素呢？在文化更为繁荣昌盛的今天，从文化层面分析晋、徽商衰落的原因，对于正确认识晋、徽商精神，从历史借鉴中有选择地弘扬晋、徽商精神，以进一步发展我们的现代经济，会有积极的启迪意义。

10. 期刊论文 [王里鹏. WANG Li-peng 晋商家族制与徽商宗族制之比较研究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 33 (4)

晋商与徽商都是驰骋近代商界之著名商帮。由于受不同的地理环境、地域文化特色等方面的影响，形成了不同的族群治理模式即家族制和宗族制。文章力图通过对两者不同的族群治理模式进行比较，发掘晋商家族制和徽商宗族制在背景、内容等方面的相同点和不同点，最终总结出不同的族群治理模式对晋商与徽商发展的影响。

本文链接：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hsxxyb201001004.aspx

授权使用：黄山学院学报(qkhsxy)，授权号：42bad40a-220b-4938-82f7-9eb90106ca8d

下载时间：2011年4月2日